

# 概念的可操作化与资料评估: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研究的难点

李若建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论文提出“非正常死亡”概念是难以操作化的, 同时中国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人口数据质量并不太高, 影响了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研究, 因此当前对当年的人口损失研究是无法精确化的。

[关键词] 大跃进; 非正常死亡; 人口统计

[中图分类号] C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07)04-0019-06

对于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得知准确答案的问题。几十年来, 海内外学者对当时的人口损失作了不少估计, 而这些估计相差悬殊。本文并非对当年的人口损失作估计, 而是从概念与资料的角度, 讨论目前是否具备作全面估计的条件。要强调指出的是, 本文并非想介入对人口损失数量的争议, 只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一些研究在方法上的基本缺陷。

## 一、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研究主要有几种类型:

### (一) 利用政府统计数据作研究

对宏观的人口损失数量作分析, 这种分析主要利用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作研究, 从而得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量。笔者所见的资料中, 最先作此研究的是彭希哲 (Peng Xizhe, 1987) 对全国各省的非正常死亡所作的研究, 在彭希哲的论文发表后, 国内影响最突出的是金辉 (金辉, 1990) 的研究, 该研究以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高得惊人的估计而引起比较大的关注。近年来有曹树基利用人口普查与地方志资料对全国及四川省非正常死亡数量估计的研究 (曹树基, 2003、2004)。

### (二) 利用抽样调查作研究

利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是海外学者, 通过人口生育率的抽样调查, 修正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 得出非正常死亡的规模。J.Banister (1984) 等著名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果, 但是这种修正的误差难以确认。

### (三) 微观的分析

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 试图用拼图式的方法去还原真实, 这类研究的困难比较大, 但也有一些尝试, 如对死亡率的分解 (李若建, 2001) 和对不同类型非正常死亡的剖析 (李若建, 2002)。

### (四) 回忆录

\* [收稿日期] 2007-08-07

[作者简介] 李若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中山大学二期 985 工程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创新基地项目“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部分研究成果。

关于饥荒的回忆录很多，不过缺乏宏观数据。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回忆录有，当年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提到，根据当年《户籍年报》，1957年四川省人口7215.7万人，另外1962年的一份文件提到1960年底四川省6236万人，由此推算四川省遭受巨大的人口损失（廖伯康，2005）。

## 二、非正常死亡概念的可操作化问题

有人指出，一个人没有活到生理上限而死亡就是非正常死亡，如果按此观点，世上没有几个人是正常死亡，当然这是一个无法操作化的“非正常死亡”概念，因为没有人知道人的准确生理上限。因此在民间把非正常死亡理解为意外死亡、非疾病死亡等等。

中国的政府统计部门有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指标，其内容包括交通意外、自杀、他杀、工伤、灾害死亡等，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也有统计在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然而，政府对非正常死亡数据并没有系统的公布，因此很难在研究工作中使用。并且政府部门公布的在1957-1963年间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110万人，明显偏低。还要指出的是，政府没有公布非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此实际数字肯定超过110万人。

非正常死亡是一个在研究大跃进人口时广泛使用的概念，大多数关于大跃进的研究，对非正常死亡的理解是超出正常死亡率之上的死亡人口就是非正常死亡，一般认为1957年的死亡率是正常死亡率。然而按照大部分研究者所理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一个不可操作化的概念。从常识上讲，要准确计算一个不可操作的指标是不可能的。

在人口学中很少用“非正常死亡”这个概念，在人口学的工具书中很难找到对非正常死亡的定义。在人口学中，主要是用死因死亡率这一概念，对于多种死因的死亡可以细分为主要与次要死因等。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人口学的方法是更合理的。研究灾难对人口的影响，最好使用人口损失这一概念。一般地说，人口损失包括：（1）直接或者间接死于灾难的人口；（2）因为灾难而减少出生的人口；（3）因为灾难而逃难的人口。关于大跃进后中国的人口损失估计，笔者已经有论文（李若建，1998），这里不重复。

虽然“非正常死亡”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但是这又是一个在研究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广泛使用的概念，因此笔者曾经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做过一个界定（李若建，2002），非正常死亡包括：（1）直接因饥荒饿死的人口；（2）直接由饥饿产生的五病而死的人口，五病指浮肿、干瘦、小儿营养不良、非正常闭经、子宫脱垂（有的地方把后两种统称妇女病，而简称四病，有的地方把肝病也列入）；（3）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口；（4）由于饥荒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使流行病严重爆发而死亡的人口；（5）工伤意外死亡人口；（6）食物中毒死亡人口；（7）其他被公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要强调的是，在上述几类非正常死亡中，只有前三类可以明确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结果，其他类非正常死亡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只是在大跃进中更加明显而已。

如果笔者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的概念可以得到认同，在操作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不过更加困难的是很难有如此分类的历史数据保存下来。

## 三、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统计体制与人口资料准确程度

除了用改革开放后的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所作的非正常死亡估计之外，其他关于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研究，都必须依靠当年的统计资料，因此当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质量如何，是进行非正常死亡人口估计的关键之一。

---

国家统计局. 中国灾情报告[R].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年, 267页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统计数据质量是不理想的，人口统计也不例外。今天要搞清楚半个世纪前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是不可能的事，只能是搞清楚当年的人口数据是如何统计上来的。

中国的人口统计体制经过了几次重大的改变：

1949-1953年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是没有严格的人口登记制度的，不过在城市的情况就比较好，如北京市在1949年就建立了比较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并没有制度化的人口统计制度。由此可见，在1953年以前，除了城市之外，绝大多数农村没有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而当年绝大多数人口又在农村，因此当年全国性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不高。

一直到1954年10月，中央内务部于1954年10月发布了《户口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后，各地民政、公安部门才逐步地健全了户口登记工作。虽然1954年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口统计制度，但是在1956年之前，城乡人口统计是分不同部门管理的，城市归公安部门管理，农村归民政部门管理，到1956年人口管理才统一归口公安部门。不过个别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如山东省齐河县1956年开始户口由公安局管理，1962年又交给民政部门管理，到1983年才归口公安局。当时户口统计人员基本上是兼职，通常人民公社户口员由秘书担任，生产大队由大队会计担任。

当年的人口统计是如何进行的，今天很难准确描述清楚，而且各地情况也有所不同，不过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情况应该具有代表性：

“人口统计一年一次，年报前逐级召开人口年报工作会议，县一般召开区、乡统计专干、秘书、公安派出所内勤人员，区、乡召开村（大队）级统计员会议，层层进行布置。落实人口年报工作任务。”

这种统计方法的准确程度，主要依赖基层干部的素质，而且用年度报表，在操作上最容易出现不满周岁婴儿死亡的漏报，从而人为降低了死亡率。在统购统销后，虚报人口数量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可以多得到按人口分配的物资。1959年在山东省农村开展了一次户口普查，在普查中发现部分公社、生产队、工矿、机关、学校，为了多分或冒领粮食而多报人口达152万余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1960年全省共查出无户口而冒领粮食者3.8万余人，假报工种者9.5万余人，吃双份粮者2.3万余人。在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中，发现不少虚报人口。例如安徽省对13个农村试点单位材料汇总，发现虚报人口现象严重。平均虚报人口4.1%，高的竟达8.7%。事实上，一些地区的农村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得相当晚，如河北省有的县到1956年才在各村设立户籍员，1962年才普遍建立户口员制度。因此当年一些地区农村人口统计质量是不容乐观的。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统计机构受到冲击，正常的统计工作受到影响，这一时期统计数据质量比较差，因此人口统计的可靠程度成问题。例如，1959年秋季广东省委规定各地死亡率不能超过2%，超过2%要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省委的用意是好的，但是这种政策很可能导致下级官员谎报数字掩饰问题。

要特别说明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是有过比较好的生命统计。1951年卫生部曾在全国32个市、县有750万人的地区内进行了生命统计。1953年扩大到全国28个省市，其中58

---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志 (综合经济管理卷 统计志)[M]. 北京出版社, 2002, 178页  
齐河志[M]. 中华书局, 1990, 564页  
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仁地区志·统计志[M]. 121页  
山东省志. 人口志[M]. 齐鲁书社, 1994, 231页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安徽省志. 计划统计志(统计)[M]. 方志出版社, 1996, 162页  
鸡泽县志[M]. 方志出版社, 2002, 559页  
郑笑枫, 舒玲. 陶铸传[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年, 266页

个试办区设在市，19个设在县。试办区总人口766万人，可惜1954年就停止了。这一调查没有形成制度坚持下来，同时这一调查也因农村样本明显不足而缺乏对整个国家的代表性。

1953年与1964年的两次人口普查资料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人口统计资料，因此建立在这一资料基础上的分析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而其他数据的可靠性相对不理想。不过从1953年到1964年这中间正好缺少了1959-1961年这三年人口变动最异常的记录，同时当年人口普查的指标太少，对分析相关问题的局限性很大。

#### 四、各类资料误差的估计

关于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料问题引起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基本上来自两个部门，一个是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另外是统计部门的人口统计。实际上统计部门的人口数字基本上是公安部门提供的，只有人口普查数字是以统计部门为主获得的。根据笔者多年来了解到的当年人口统计资料，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1. 原始的公安部门的常规人口登记。公安部门每年都有例行的人口登记，并且从1954年以后汇编整理，从1986年后开始公开出版。这一资料的优点是当年的记录数字，尽管不能排除当时就有人修改数据，但是在没有足够证据之前，应该认为其可信程度相对高。这一资料的问题有三点：一是至今没有完全公布当年的数据；二是当年基层统计工作水平低，不排除存在工作失误，笔者曾经查阅过一个县级市当年的人口统计档案，乡镇一级的统计相当粗糙；三是当年的统计与现行的行政区划不一定吻合，使用不方便。

2. 经过整理的公安部门的常规人口登记。1985年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发出关于编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4）》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整理历史人口数据。这个通知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要求总人口以当年行政区划划分为主，还要按1982年行政区划调整，但是出生、死亡等人口可以不调整。

1988年国家公开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4）》。在国家统计局、公安部等部门指导下，全国各地在不同程度上整理了本地区的历史人口资料，至少大部分省份印刷了这些资料，并且一些地区还将资料公开出版。由于存在着数据调整，因此对这类数据引起争议，有人表示怀疑。笔者认为，虽然这些数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整理数据时已经距离饥荒20多年，因此大部分地区不会故意篡改数据。

3. 人口普查数据。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中国分别进行了三次人口普查，大饥荒发生在1953和1964年之间，因此这两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估计饥荒损失人口极为重要。这类资料的问题两点：一是普查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误差，特别是1953年的人口普查中，对一些边远地区没有直接调查；二是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指标太少，影响到分析的可靠程度。虽然1982年的人口普查质量比较高，指标也比较多，但是距离大饥荒时间太长，用1982年资料推算当年的情况，误差很大。

4. 20世纪80年代的其他人口调查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生育率调查，因为时间最接近，因此1981年全国1‰的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对研究饥荒对人口损失的影响最有用。这一资料的问题是主要局限于生育方面，死亡率的估计比较困难，因此比较少见到国内学者用这些资料分析困难时期的人口。

5. 其他部门资料，特别是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的资料。医疗卫生部门有死因统计，有些地方还有非正常死亡统计或者是直接死于浮肿的统计，因此对分析饥荒造成的人口影响有帮助，不过这

些资料因为其覆盖面小，在代表性上有一定的局限。

6. 地方志资料。严格的说，地方志作者本人是不会创造历史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地方志中的人口资料，基本上出自上述1、2、3和5类资料，如果上述资料存在问题，地方志的资料同样有问题。除了和其他资料共同的缺陷之外，地方志中的人口数据还另外有几个问题：其一是近年编写地方志是按照现行的行政区划进行的，因此一些数据不可比；其二是各地方志中的人口志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汇总和比较分析非常困难；其三是地方志作者受本地各种因素影响，编写人口志时的顾虑比较多，因此过分依赖地方志反而可能出更大的错。其四是至今地方志的出版还没有完全结束，有些县的地方志是空白。当然，不排除各别地方志作者，通过大量的原始档案分析，对本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有一个正确的结论。笔者曾经查阅过约两千种近20年出版的地方志，并没有发现有这种分析存在。

7. 生育率调查。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对全国101.76万名妇女作了生育史的调查。由此资料可以对历史上的人口出生率作修正，但是这一调查只是对妇女存活子女数和1980、1981年两个年度的婴儿死亡率进行调查，并没有对妇女所有生育子女的死亡时间进行回顾，因此用这一资料去推算历史上的婴儿死亡率的误差是非常大的。

1985年和1987年国家两次进行深入的生育率调查，不过这些调查的范围有限，第一次在上海、河北和陕西（国家统计局，1986），第二次在北京、辽宁、山东、广东、贵州、甘肃（国家统计局，1989），这些地区中，除了甘肃之外，并非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地区，因此用这些数据修正当年的资料也有比较大的误差。除了代表性问题之外，这两次调查对历史上的婴儿死亡率作了估计，前者只是粗略估计了1965年前上海、河北和陕西三地的婴儿死亡率，后者则是估计1970年后的婴儿死亡率，对本文所关心的研究并没有意义。

从上面介绍的资料中，不难看出，至今没有一个资料能够真正解决计算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特别是计算非正常死亡这一难题。如果一定要估计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好是在充分占有各类资料的基础上，比对分析各种资料，然后才可能得出比较可信的结果。

## 五、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

1. 现有的研究思路是建立在一个无法严格操作化的概念（非正常死亡）之上的，因此这种思路本身就导致无法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量结果。

2. 当年的人口统计无论是体制上还是方法上都是有明显缺陷的，因此当年的人口资料还无法支撑起对当年损失人口的准确估计。

3. 根据上述两点，目前不具备准确估计当年人口损失的必要基础。

笔者认为，无论是非正常死亡一千万还是三千万，无疑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今天所作的研究目的是不要让惨状重演。因此客观公正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资料条件不理想的前提下，任何研究都应该特别严谨。

## [参考文献]

- [1] 曹树基. 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1)
- [2] 曹树基.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1)
- [3]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J]. 1983年.
- [4]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1983)[M].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103页
-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国家报告[R]. 1986.
- [6] 国家统计局. 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国家报告[R]. 1989.

- [ 7] 廖伯康.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1)[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 [ 7] 李成瑞.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J]. 中共党史研究, 1997(2)
- [ 8]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原因分析[J]. 21世纪(香港), 2002年8月号
- [ 9] 李若建. 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J]. 人口研究, 2001(5)
- [ 10] 李若建. 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J]. 社会学研究, 2001(6)
- [ 11] 李若建(a).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J]. 开放时代, 2000(5)
- [ 12] 李若建(b).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流动人口[J]. 中国人口科学, 2000(4)
- [ 13]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J]. 中山大学学报, 1999(1)
- [ 14] 李若建. 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4)
- [ 15] 李若建. 前事不忘: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随想[J]. 现代与传统, 1996(10)
- [ 16] 李若建. 中国人口迁移统计失实原因[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岭南社会学文集), 1994
- [ 17] Peng Xiz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3 No.4 1987
- [ 18] J.Banister,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0 No.2 1984.

### Feasibility and Measurability of Concept and Material Evaluation: The difficulty on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Loss During the Great Leap Period

Li Ruojia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Partially because the concept, abnormal death, is not cleared defined and very difficult to measure,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demographic data quality of China from 1950s to 1960s is not satisfactory, the research of the population loss during Great leap is affected and it is not hard to have a clear conclusion on the the population loss of that time.

Key words: the Great Leap, Abnormal death, Demographic statistics